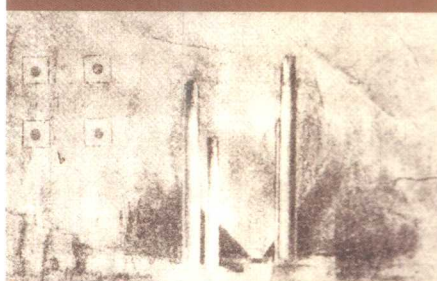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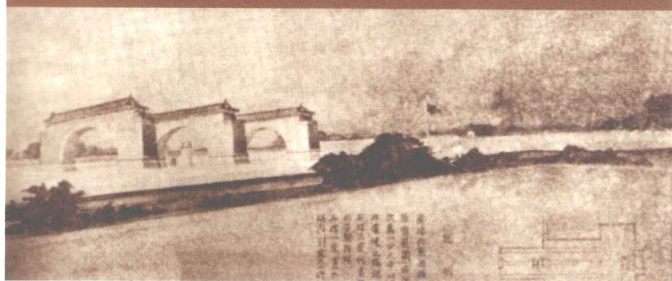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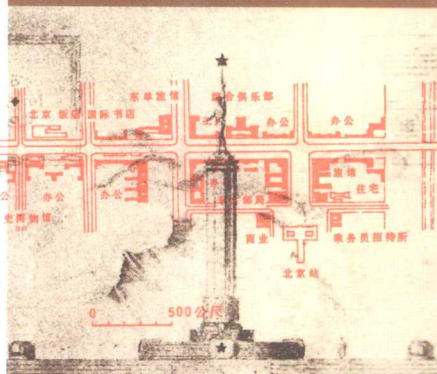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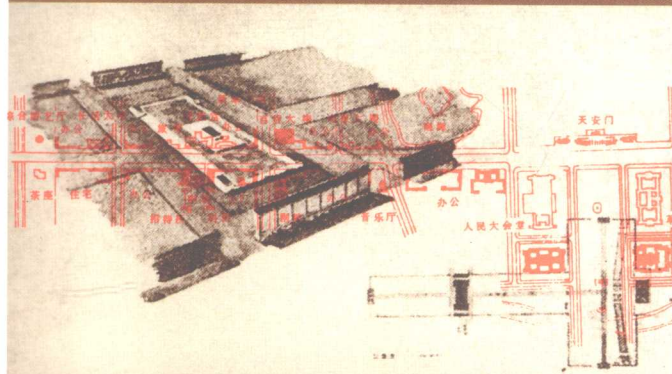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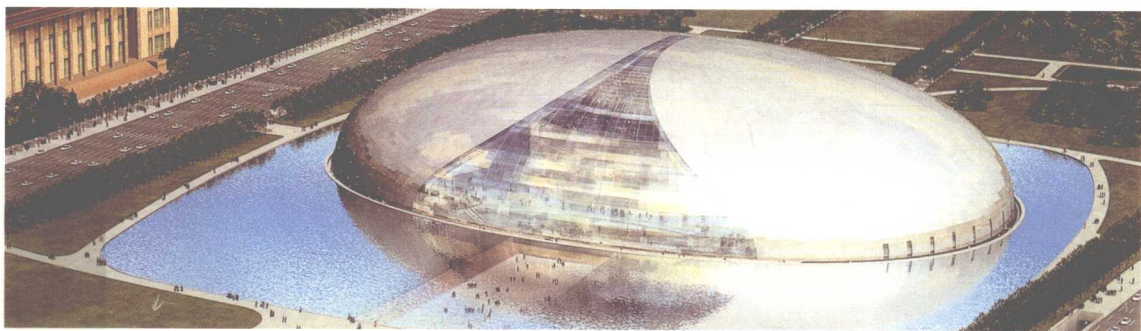


# Chang'an Avenu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于水山 著  
程博 于水山 译

## 长安街与 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ang'an Avenu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于水山 著  
程博 于水山 译

# 长安街与 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2012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 / 于水山著，程博，于水山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

ISBN 978-7-108-05394-7

I. ①长… II. ①于… ②程… III. ①城市道路—建筑史—研究—北京市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2994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280 千字 图 101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长安街在城市文脉中的历史 .....	13
第二章 民族的与现代的：20世纪50年代 .....	65
第三章 集体创作：1964年长安街规划 .....	127
第四章 在后现代世界中的现代化：70年代与80年代 .....	179
第五章 无计划的拼贴：迈向新千年 .....	223
第六章 长安街与北京城的轴线 .....	295
结论 全球语境下的长安街 .....	337
中文版跋 .....	351
英文参考文献 .....	357
中文参考文献 .....	367
术语表 .....	375

## 引言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毗邻东长安街<sup>1</sup>的北京医院离世了。1月11日上午，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白色灵车，由上百辆轿车组成的车队护送着，缓缓地驶出医院，开往位于西长安街终点的八宝山火葬场。上百万群众沿长安街排开，目送着周恩来的灵车，向这位人民敬爱的总理做最后的道别。<sup>2</sup>当天傍晚，沿着同样的路线，人们将周总理的骨灰护送回东长安街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并安放在那里，这座宏伟的建筑在明清两代是皇室的家庙，也就是太庙。在长安街的两侧，送别的人群从八宝山绵延至劳动人民文化宫，静穆地凝望着周总理的骨灰归来，队伍的长度超过了20公里。无数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长安街上静候着，在冰冷的雾霭中肃立了数小时之久。在此后的三天，周恩来的骨灰被安放在太庙的大殿里，供群众进行最后的瞻仰。1月14日，接近傍晚时分，周总理的骨灰由车队护送着，跨过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是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建造的，当时，它是新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十大建筑”之一。在这里，瞻仰活动持续进行着。1月16日，政府为周恩来举行了追悼会，此后，将他的骨灰再次沿长安街运送至八宝山，安放在革命公墓。<sup>3</sup>

---

1 在本书中，已将长安街的不同部分进行了明确界定。定义见术语表。

2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香港《文汇报》，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移送八宝山火化》，香港《文汇报》，1976年1月12日。

3 《全国沉痛哀悼周总理》，《文汇报》，1976年1月15日。根据1月15日报纸的描述，这是原定计划。但是此后，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描述，按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通过飞机被撒在了祖国江河大地之间。

周恩来去世三个月之后，在清明节（4月4日）的前夕，无数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这座建筑位于长安街的南侧，占据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在这里，人民群众再一次向这位已故的总理表达着敬意与思念之情。人们携带着花圈与条幅，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布置成了一座纪念周总理的丰碑，并很快将其转变成了批判当时执政者的堡垒。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献礼已经被拆除，不满的群众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并沿长安街展开了抗议活动。数以万计的民众与警察展开对峙，时间持续了数小时之久。4月5日，清明节后的第一天，在安全部门发出警告之后，仍然拒绝离开广场的人被拘捕了起来。<sup>1</sup>这就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四五运动”。

时间到了1976年的秋天，“四五运动”过去几个月之后，毛泽东主席也逝世了。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集团，即所谓的“四人帮”，相继被捕，长安街又成为了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场所。10月24日，长安街再一次淹没在红旗的海洋中。上百万群众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周围，并沿着长安街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和新领袖华国锋的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华国锋由国务院副总理一跃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身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sup>2</sup>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俯望着台下，向群众挥手致意。此时此刻，一边是观礼台上的领导人，另一边是广场上的人民群众，两者皆静立瞩目；在这两者之间，望不到头的游行表演队伍缓缓经过，用无数个体组成的滚滚洪流表现着国家的多样与统一、辉煌历史与光明未来。而这个动态的欢庆舞台就是长安街。

长安街是北京20世纪的城市主干道，1976年发生的一切仅仅是这条街道上所上演的一系列庆典、冲突、哀悼等活动序列中的一环。公众情感的瞬间爆发不时打断精心安排的国家仪式，这一现象已经构成长安街文化与政治历史的显著特征。长安街沿线的都市与建筑空间不仅为重要的文化与政治事件提供了舞台，其本身也成为了折射现

1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649–50.

2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为党领袖》，《人民画报》（1976年12月），1—23页。

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符号

长安街位于明清皇宫紫禁城与新中国修建的天安门广场之间，是一条贯穿城市的主干道。从清朝（1644—1911）晚期至20世纪末，长安街的发展与近现代北京所发生的充满戏剧性的都市变化息息相关。它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都市空间，也是中国首都城市布局中新形成的东西方向轴线。长安街见证了各种建筑风格的兴衰、文化思潮的转变、艺术创作的组织、政治介入的方式以及全球化的冲击。对于探索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的议题，它在诸多方面都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就如长安街本身一样，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一直是以一种无法完全实现的方式被定义着。当讨论现代中国建筑时，“现代性”的概念伴随着现当代世界建筑的最新潮流始终在不断变化着。同样，每一段特定时期的人们都以当时对现代化的理想为目标，声称：要在不久的将来，基本完成长安街的建设。然而，每一次这样的“完工”无论在实体性（physical）还是象征性（symbolic）上都给未来的“完工”留下了新的“缺口”（gaps）。由此，长安街成为了一个始终无法实现的现代化的特殊符号。

包括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内的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对于亚洲与非洲的国家而言，西方的强权表现为西方是“现代性”的界定者，即文明与进步的标杆，同时又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达到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是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先决条件。<sup>1</sup>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只是以单向和单一的模式运行着。中国人观念中的“现代”有着高度的选择性，同样，西方人眼中的现代性也并非一成不变。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建筑技术、形式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突变，但是中国观念中的建筑现代性始终在一条趋向历史连续性的道路上行进。在当代西方建筑的语境里，“现代”可以是过去时，而在20世纪中国建筑的语

---

1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1.

境里，“现代”却总是带有将来时态的意味。每当讨论如何处理“传统”在当下的问题时，中国人总是专门采用“现代化”一词而不是“现代”。

有两个基本的事实使长安街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想符号。首先，一条贯通的长安街恰好是诞生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帝国体制结束之后。其次，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长安街不断得到发展延伸，并最终成为了北京的东西轴线，而功能性的改造始终是这种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天安门广场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符号，而长安街无论是实际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只是为天安门广场服务的。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进入天安门广场参加各种庆祝活动，长安街被拓宽了；为了使城乡更好地结合，长安街被延长了；为了使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更好地看到游行队伍，长安街沿线道路的各个交叉点得到了精心的规划。在某种意义上，天安门广场充当了“主人”，成为了目光的焦点，是主动的、阳性的；而长安街此刻扮演了“仆人”的角色，形成了舞台的背景，是被动的、阴性的。

然而，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庆祝活动期间，长安街都是一个动态性的空间，而天安门广场却是静态的。在国庆日，部队与群众代表沿着长安街编队行进，而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则与彩旗一起形成背景图案。从这种意义上，长安街变成了重要的舞台，是活跃的、主动的、阳性的，而天安门广场则退隐为背景，是静态的、被动的、阴性的。在后来的发展中，长安街不仅超越了天安门广场的光彩，而且使广场所属的古都南北轴线也黯然失色。在超过五百年的时间里，沿紫禁城展开的南北轴线一直统辖着北京城，并将长安街截成互不相通的两段；辛亥革命之后，长安街横穿过了旧时南北轴线的中心位置，在它的北侧是昔日的皇城与紫禁城；在它的南侧则扩充建设了天安门广场。

现代主义，特别是敌视传统的先锋派（*avant-garde*），<sup>1</sup>培养出了一种历史意识，它以时序上的独特性作为判断历史性（*historicity*）合法存在的基础。一方面，现在应该有别于过去；另一方面，未来应该与现在有所不同。于是，崇拜“新事物”（*the cult of*

---

1 Wood, *Challenge of the Avant-Garde*.



the “new”) 的情结将“现在”从历史的延续性中提取了出来。<sup>1</sup>现代性是原点，分别向着过去与未来两个方向延展。长安街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并向东西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它成为了这种以线性特征为编年标志的现代性的绝好隐喻。现代性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画出一道观念上的边界，而长安街则在物理空间上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建筑领域，还有从形式或价值判断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的其他定义。<sup>2</sup>然而，促使现代性成为一个独特历史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历史性的自觉。现代性创造出了过去与现在的边界。现代之所以是现代，不是因为过去向当下自然而然的年代延伸，而是主动脱离过去的一种自我感知。过去的东西被宽泛地界定为“传统”。实际上，“现代的”和“传统的”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探讨20世纪的中国建筑时，“现代的”又往往会被作为“民族的”对立面加以讨论。一个令人满意的建筑作品应该在“民族的”与“现代的”两者间取得平衡。“民族的”属于褒义词，意味着现在；而“传统的”属于中性词，意味着过去。例如毛泽东曾经就说过，中国与外国的传统都存在着精华与糟粕。<sup>3</sup>然而，“民族的”与“传统的”之间的差异却从来未被清楚地定义过。在概念上同时与“传统的”和“民族的”两者相对立，中国的现代性悄无声息地涂抹了自己此前所画出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

## 学术研究的独立单元

长安街可算是中国最著名的大道，以“神州第一街”的美誉而闻名遐迩，<sup>4</sup>其本身

1 Kuspit, *The Cult of the Avant-Garde Artist*.

2 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理论家更多倡导从形式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定义，例如Henry-Russell Hitchcock和Philip Johnson的形式原则或是Sigfried Giedion的空间理论。近期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偏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定义，例如阮昕将建筑的现代性界定为公益性宗旨，其对立面是毫不隐晦的对文化独特性的强调。参见Hitchcock and Johnson,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Cody, Steinhardt, Atki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153-68。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666—668页。

4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等，《长安街》，9页。

值得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加以探讨。清王朝瓦解之后，长安街无论在长度还是宽度上都得到了扩展，并且在20世纪末期，成为了社会主义首都新的东西轴线。在中国，长安街与它最著名的组成部分——天安门广场，是举行政治庆典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帝制结束后（1912年至今）的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演的舞台。民国时期（1912—1949），长安街是抵制当权者的主要阵地。<sup>1</sup>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1949年至今），它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展现国力、宣扬国家神话的新舞台，这种功能在每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sup>2</sup>

长安街将一系列不断扩展的政府大楼和富有政治意义的工程项目串连起来。自1949年以来，它成为国家展现社会主义成就的主要场所，大多数国家庆典都在这条主干道沿线举行。长安街两侧的建筑立面形成的图像，对外成为了海外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对内则是全国各族人民感知祖国建设的一面镜子。因此，长安街成为城市规划的样板，也是引发中国主要城市改造的促进因素。将长安街的发展并入中国首都的东西轴线，这种做法是一个典范之举，这在城市规划中展现了一个革命性的姿态，即社会主义的首都北京与帝制时期的身份一刀两断。其他的中国城市追随北京，也发展出公共庆典的主要街道，这些街道穿过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城市中心，并将中心广场与主要纪念性建筑物串连起来。

长安街无论在现实性还是象征性上，作为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中国建筑界给予它最高的关注；在全国的城市中，它成为影响到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样板。在经济领域里，相同经度的地段，纬度上越靠近长安街，地位就越优越。许多房地产公司在他们的广告中都会附有一张旗下地产的地图，而这张地图都会以长安街作为位置参照。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毗邻长安街将会带来极大的利益。

---

1 这些抗议活动包括著名的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1935年“一二·九运动”和1947年的反专制运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国庆庆典的重要例子包括1949年建国庆典、1950年周年庆典、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1984年为展示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派政府的成就而举行的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1989年建国四十周年庆典、1999年为庆祝香港回归以及澳门即将回归的五十周年庆典活动。

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对象，长安街提供了一个城市研究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的链接。通常，城市历史学研究整个城市，而建筑历史学研究建筑单体。研究城市历史的学者着眼于城市宏观结构的演化，对城市肌理细部更迭的描绘则相对模糊。相比之下，研究建筑历史的人专注于独立的建筑物，对于建筑单体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整体变迁只做片段化的叙述。

针对这一学术两难，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街道空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街道可以将宏观的城市史与微观的建筑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20世纪中国首都的长安街直接相关。例如，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对郝斯曼式（Haussmannian）或墨索里尼式（Mussolinic）之“拆毁美学”（aesthetics of demolition）的讨论和对“城市保护”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关联的分析；<sup>1</sup>又例如格雷格·卡斯蒂略（Greg Castillo）对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在20世纪30年代重建中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socialist realist aesthetics）的讨论；<sup>2</sup>再例如泽伊内普·塞利克（Zeynep Celik）关于街道作为空间互动于仪式与意识形态的分析。<sup>3</sup>由于有限的篇幅并且缺乏细节，这些关于城市街道的文章大多只勾勒出了宏观城市肌理的变迁，而较少对建筑单体进行具体讨论。

本书则专门致力于长安街这一唯一贯穿整个北京城的主干道，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首都城市改造发展中的特殊作用。长安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建筑项目最大、最集中的建设场所。对城市肌理的变化做详细的考察，选取部分纪念性建筑物作为重点加以深入讨论，将有助于理清建筑单体的建设如何作用于宏观的城市图景。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介于传统的城市历史与建筑历史等学科之间，通过聚焦长安街这样一条

1 Kostof, "The Emperor and the Duce," 270–325.

2 Greg Castillo, "Gorki Street and the Design of the Stalin Revolution." In *Stree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edited by Celik, Favro, and Ingersoll et al., 57–70.

3 Zeynep Celik, "Urban Preservation as Theme Park: The Case of Sogukcesme Street." in *Stree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edited by Celik, Favro, and Ingersoll et al., 83–94. 其他关于城市街道的学术研究，Jacobs、Macdonald、Rofe 题为 *The Boulevard Book: History, Evolution, Design of Multiway Boulevards* 的书中提供了关于设计与建造现代林荫大道的技术与历史的概况。James Trager 题为 *Park Avenue: Street of Dreams* 的书聚焦在文化影响与社会政治环境对纽约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发展的作用。

连接城市中纪念性建筑物的主干道，旨在为这两个学科之间建造一个“构造连接点”（tectonic joint），以期促进对这两个领域更好的理解。

长安街案例同样提供了创建文化历史与建筑历史两个学科之间链接的机会。以往对北京的研究集中在两种方法上：一种方法强调城市空间的文化与政治内涵以及建筑象征意义的演化；另一种强调在首都城市发展中特定技术上的专业策略与方法。前者将建筑与都市生活作为文化历史与政治历史的一部分；后者主要将城市与它的建造环境视为规划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各种相应对策的历史。围绕长安街上每一个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的辩论都使它成为一个建筑文化研究上的理想备选。在发掘长安街建筑意义的不同历史层位时，把对具体对象的研究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将会是有效的工具。

先前学者们对帝制时代的北京所做的文化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社会政治方面的框架，<sup>1</sup>而关于民国时期北京的研究则为理解北京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重大改造之前的城市环境打下了基础。在勾勒北京于20世纪前半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政治变革时，有些研究将民国时期的北京展现为一个新与旧的混合体，<sup>2</sup>有些研究则揭示出解放前的“老北京”并没有新中国时期所设想的那么古老与传统。<sup>3</sup>对于理解1949年以前北京的都市生活与城市空间演变的情况，一些中文出版物提供了部分不可或缺的历史细节。<sup>4</sup>一部分关于新中国都市文化的学术研究则将目光集中在了作为政治符号的天安门广场上。<sup>5</sup>在关于天安门广场纪念性建筑物政治历史方面的研究中，巫鸿探索了建筑与城市空间是如何被赋予了含义，以及在变迁的文化政治语境中，这些含义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sup>6</sup>对于后毛泽东时代（1976年至今）北京的研究则探索了与日俱增的商业化对都市生活与空间布局的影响。<sup>7</sup>

1 Meyer, *Dragons of Tiananmen*; Susan Naquin, *Peking*.

2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3 董玥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4 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 史明正,《走向现代化的北京城: 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

5 巫鸿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6 巫鸿, "Tian'anmen Squar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numents," *Representations* 35(Summer 1991): 84-117.

7 Davis et al.,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roudetoux, *The Making and Selling of Post-Mao Beijing*.

虽然这些研究富含都市生活与物质文化变更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但是它们往往将建筑与城市发展看作是文化与政治历史的注脚。在这些著述中，北京的建成环境基本上充当着过往的一幕幕历史剧的背景，不管是宏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而并非是它们之中积极的参与者。尽管那些关于新中国时期北京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城市空间象征性的含义，但它们却频繁地将营造政治空间等同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展现。无论作者们的原意如何，那些描述新中国建立前北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都倾向于将“老北京”浪漫化。<sup>1</sup>大多数这类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都忽略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声音。对于社会主义的城市策略，这些研究经常不假思索地将批评指向中共领导人个人偏好的失败以及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热衷，<sup>2</sup>同时，新中国时期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则很少被人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过。

通过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建筑历史并非是简单地将建筑学视作建筑社会学。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就认为艺术除了它的社会使命以外还有其自身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看法是对的。<sup>3</sup>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风格与形式分析（stylistic analysis）传统、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以及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的概念，只要不是被以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方式无限放大美学价值的普遍性，都是有用的分析工具。尽管不存在绝对客观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历史知识，然而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中，却总有一些作为创作者奋斗目标的关于艺术与建筑的标准，要么是所要追求的理想，要么是所期打破的范式。毋庸置疑，艺术、建筑只有保持着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才使得思考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成

1 举一个例子，在一本书的末尾，Susan Naquin写道：“从开始动笔到现在几近收尾，我都不想让这本书的写作成为一个怀旧的游戏，无论是对那些消失的庙宇还是对这座失落的城市。事实上，它恰恰是想对这座城市永恒的过去进行历史的还原。然而，面对目前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的巨大破坏，即便是短短的一瞬，这本书就连对于作者我来说都像一本《东京梦华录》。”参见Naquin, *Peking*, 708。

2 例如王军的观点认为，毛泽东个人对苏联顾问的支持，是建国之初将新行政中心设立在北京的心脏地区的主要原因。参见王军《城记》，86页。吴良镛则谴责了强烈的苏联势力介入对老北京的破坏。参见吴良镛，*Rehabilitating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18–23。

3 Arnold Hauser,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59), 3–17.

为可能，并且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文化总体。

针对20世纪中国建筑的问题，部分学术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描述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和北京建成环境之演变的。其中有的展现了一些基本事实，并简要介绍了新中国建国五十年来重要建筑项目，同时概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建筑方针；<sup>1</sup>有的记录了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些关键时刻，并提供了许多设计的主要图纸。<sup>2</sup>在中国城市规划界，吴良镛作为设计实践与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将目光集中在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上，着重解决北京旧城改造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的理论。<sup>3</sup>以上这些研究多是由实践型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撰写完成，因其丰富的专业信息和广泛的资料性描述而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设计师只关注于实体建筑的问题，其工作范围预先就假定，对建成环境的改造仅是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并没给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化政治分析留下多少空间。本书力求两者兼顾，通过对建筑单体以及城市规划中的具体设计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展现出长安街的文化与政治历史。

## 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是本书的理论核心。本书中的“现代性”所指的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观念中界定出的现代文化的决定性特征。要成为“现代”，不仅意味着始终意识到存在着与“现代”相对立的“传统”，同时还意味着对“未来”先进性本质的坚信不疑。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现代化工程，“现代化”对于“现代”在概念上有意识的替换反而创造出了无意识的历史连续性，并反映在人们无休止地追求“完成”长安街建设的努力中。

近期，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建筑风格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有的观点认为：

---

1 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史》。

2 张敬淦，《北京规划建设五十年》。

3 吴良镛，《Rehabilitating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建筑领域中的现代主义只是一小部分建筑师、历史学家与评论家的刻意之说，他们为了满足自圆其说的历史叙述而将其他实践从群体记忆中全部剔除。<sup>1</sup>有的观点提出，应该用作为方法论范式的“现代主义议题”（discourse of modernism）来替换“作为风格范式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as a paradigm of style），这样就能解决当代在讨论20世纪建筑时所出现的分析上的问题与莫衷一是的情况。<sup>2</sup>这种替换将现代主义从一种风格转换为一个基于某种道德判断的物质实践。无论是现代主义对应传统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对应地方主义（regionalism），如果这些概念在西方只是人为虚妄的对立，那么将它们移植到中国，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现代主义”一词也只有议题上的价值（discursive value），而不代表笔者在风格上的任何价值取向。它只是为展开中国建筑的现代性而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公共平台，为不断更新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修辞学上的基础。

关于北京以及中国现代建筑最新的学术研究将兴趣点集中在现代性的问题上。在跨文化的理论框架下对帝制时代的北京进行权力架构与主体性（power and subjectivity）的分析，为研究这个古都的南北轴线提供了新思路。<sup>3</sup>在概念运用上采取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或者“体”与“用”的对立，使针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大叙述（a master narrative）成为一种可能，但同时也令人期待更有批判性的论述的出现。<sup>4</sup>有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将中国现代建筑实例纳入全球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和语境中，并为现代性探索西方以外的模式。<sup>5</sup>一些关于中国现当代建筑环境的研究则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建筑现代性的某些独特方面，例如作为城市形态的“单位大院”。<sup>6</sup>

与西方相比，中国建筑的现代性还具有其他很多独有的特征。例如，自1949年以来，重要的建筑作品一直采用集体主义的方式产生，很少铭记下创作者个人的姓名。

1 St. John Wilson、Peter Blundell-Jones、Kenneth Frampton,以及Giorgio Ciucci等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子。

2 Sarah Goldhagen,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3 Jianfei Zhu, *Chinese Spatial Strategies*.

4 Rowe and Seng Kuan, *Architectural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

5 Jianfei Zhu, *Architecture of Modern China*.

6 Duanfang Lu, *Remaking the Chinese Urban Form*.

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社会产品与艺术品的边界不总是那么清晰，一件艺术品并不一定非要和创作个体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sup>1</sup>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创作的立场与欧洲20世纪早期先锋派运动的主张十分相似，而那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却将先锋派运动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堕落艺术。在讨论中国建筑的现代性时，如果用解构主义的眼光来解读材料，<sup>2</sup>以上的问题就不会显得前后矛盾。这些材料不仅包括当时的图纸与档案等文献，更包括一座座实实在在的建筑物，而制造这些材料的历史实体就是人们所要了解的“现代中国”。

当代的中国瞬息万变，长安街同样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活力。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响亮开场，人们的一部分注意力从长安街移向了北京城新近复兴的南北轴线。然而，近期在长安街南侧国家博物馆前的位置，一尊孔子雕像的安放与迁移再一次彰显了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空间控制权的争夺。<sup>3</sup>长安街的历史，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为理解诸如此类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实体的与观念的结构框架。

---

1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 解构主义的解读在这里是指发现那些讨论中国建筑现代性问题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无论其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解构式解读所要揭示的是这些文本中隐含的蛛丝马迹与先入之见。

3 Andrew Jacobs, "Confucius Statue Vanishes Near Tiananmen Squar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4/23/world/asia/23confucius.html>).



# 第一章

## 长安街在城市文脉中的历史

